

赖文光宁死不屈

东捻军在赣榆和寿光血战中失利，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一时间，乌云密布，妖雾重重，革命形势极端险恶。但是，捻军战士并没有被反动势力所吓倒，他们在赖文光的领导下，怀着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继续与数十倍于己的清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1867年12月末，寿光战役刚刚结束，赖文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以利再战，立即率领队伍从山东南撤，向江苏飞驰疾进，以摆脱敌人的追击阻截。东捻军长期以来转战四方，风餐露宿，得不到休整，在粮草、武器愈来愈短缺，敌众我寡，万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斗志旺盛，毫不气馁。当他们从山东进入江苏境内时，就与从浙江前来拦截的清军相遭遇，奋勇击败了敌人。接着，又一鼓作气突破六塘河的敌人防线，准备乘胜抢渡运河。但是，这时东捻军毕竟人数过少，几次抢渡均未成功。东捻军只得南走淮安、宝应、邵伯（均属江苏省），1868年1月初到达扬州东北湾头瓦窑铺。当地群众早就知道赖文光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英雄，渴望捻军的到来。捻军一到，老百姓无不兴高采烈，扶老携幼，提水送茶，迎接亲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时发出这样的歌声：

竹叶青，竹叶长，
太平军^①路过瓜州塘。
打开坛子翻开瓮，

^① 当时革命群众也称捻军为太平军。

家中没有一粒粮。
太平军，恩难忘，
烧杯清茶敬遵王。

歌声表达了劳动人民对捻军的热爱，和对遵王赖文光的崇敬，歌声也反映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在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下，迫切盼望得到解放。

1月5日晚上，赖文光率领队伍打算从瓦窑铺渡过运河，经安徽，杀往西北，与西捻军会合，再图大举。可是，奸狡的敌人已把运河上的民船统统掳走。面对滔滔的河水，怎么办？富有斗争经验的捻军，立即在运河两岸拉开长布，以布为桥，抢渡运河。这时，驻防在扬州的淮军，倾巢而出，枪炮齐发，分四路向捻军猛扑。东捻军抢渡又告失败，和敌人又展开了一场恶战。

这是东捻军的最后决战。在这紧要关头，赖文光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硝烟（xiāo 烟）弥漫的火光中，手持黄旗沉着指挥，他身先士卒，出入重围，驰骋冲杀，愈战愈勇，所向无敌。战士们在他的激励下，齐心合力，以一当百，争先砍杀，杀得清军横七竖八，尸横遍地。敌人每逼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但终因众寡悬殊，力量单薄，在多次短兵相接，奋力拼刺，重创顽敌之后，英雄的东捻军，除了一小部分冲出火网，迅速转移到安徽以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他们碧血丹心，为革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赖文光在这场决战中，身受重伤，最后，他骑的那匹战马也中弹跌倒。敌人乘机蜂拥上来，赖文光不幸被俘。

赖文光在战场上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英雄，在敌人的“公堂”上是一个威武不屈的硬汉。他横眉冷对凶恶的敌人，巍（wēi 巍）然挺立，面不改色。当敌人逼他写降书时，他却大声斥喝，

下笔千言，慷慨悲歌，颂扬太平天国的光辉业绩，义愤填膺（yīng 鹰）地痛斥清军残酷杀害人民的滔天罪行。最后坦然写道：“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充分表达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赖文光英勇就义，他那崇高的革命形象，永远受到革命人民的崇敬。

赖文光（1827——1868 年），广西人，是太平天国的一名优秀将领，也是后期捻军杰出的组织者和领袖。当太平天国在金田宣布起义时，赖文光就投身于农民革命，在洪秀全的教育和培养下，很快成长起来。革命初期，他在天王洪秀全身边工作，后来奉命征讨江北敌军，是英王陈玉成的得力助手。在历次战斗中，屡建战功，1861 年被封为遵王。1862 年 2 月，奉英王之命，远征西北。这支远征西北的太平军从庐州（今合肥）出发，转战河南、陕西直抵汉中，给清朝在西北地区的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

1864 年，天京沦陷，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在这种极端艰危的形势下，赖文光没有丧失挽回危局、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念，他怀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力挽狂澜，毫不犹豫地继续举起革命旗帜，将捻军和太平军余部合并，组成一支崭新的捻军队伍。这支革命队伍，在他的领导下，紧密团结，“誓同生死”，喋（dié 碟）血苦战。新捻军在斗争中，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兵强马壮的革命大军。他们以粗劣的大刀、长矛，继续打败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清朝“王牌军、湘军和淮军。四年多以来，新捻军疾风骤雨般地驰骋在黄、淮大平原上，攻无不摧，战无不胜。反动的清朝政府在新捻军打击下，“王牌军”全军覆没，显赫一时的“僧王”见了阎王；湘军丧兵折将，大刽子手曾国藩的“剿捻”计划，遭到彻底破产；淮军多次溃败，大卖国贼李鸿章也发出阵阵哀叹。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捻军和太平军余部组织成为一支崭新的革命劲旅，继续战斗达四年之久，多次斩敌将、灭敌军，使整个革命形势在低潮中一度回升，打开局面，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所有这一切，都与赖文光坚持革命、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他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和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是值得我们讴歌的。至今，在淮北人民群众中，还传诵着“智勇双全是遵王”，“遵王大刀三尺高，清兵一见魂飞跑”等民歌。遵王赖文光，不愧是近百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英雄。

列强开辟租界

道光 22 年（1842 年）8 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英国人可以携带家属到此居住。次年 10 月，又签订了《虎门条约》（原称《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规定“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及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等。英国人不仅获得在五口租地建房，永久居住的权利，而且还得到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道光 23 年（1843 年），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上海，和该地道台宫慕久交涉，租下城外黄浦江边的 130 亩荒地作为领事馆区域。

道光 25 年（1845 年）11 月，宫慕久用告示的形式，公布了与巴富尔协议的《上海租地章程》（又称土地章程）根据这个章程，中国方面“决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一作李家庄）以南

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以为建筑房舍及居留之用”。东侧以黄浦江为界，西边于次年九月议定以边路为界、全面积约 830 亩。并且作出洋商租地建屋后，即可停租也可转租他人，但“业主不得任意停租”；“租地租屋洋商应会商修建木石桥梁，保持道路清洁，树立路灯、设立灭火机，植树护路、控沟排水、雇用更夫。领事馆经各租主请求，召集会议，公同商议，摊派以上各项所需经费”；“他国商人愿在划归英商承租之洋泾浜界址内租地建房或赁屋居住、存货者，应先向英国领事馆申请、藉悉能否允准、以免误会”等项规定，这为上海的“租界”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英国领事召集租地的外国商人按年开会，推选最初只有三个人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办理道路和码头事宜。道光 28 年（1848 年），英国第二任领事阿礼国又以所谓的“青浦事件”为借口，强迫新任的上海道台麟桂答应扩充英租界的要求，使之向西伸展到泥城浜（今西藏路），向北开拓到苏州河边，整个租界面积扩大到 2820 亩。同年 1 月，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到任，即与早已到达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商议，并通过法籍主教赵方济在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的地段内租赁房屋，设立领事馆。“青浦事件”后，上海道台吴健彰又屈服法领事的压力，于道光 29 年（1849 年）4 月发布公告，规定以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城河）与英租界（南界的洋泾浜）之间，总面积约 980 亩作为法租界区域。并规定：“各国人如愿在租界内租地建屋者，应向法国领事商明办理”。除此，还迫使上海道台宣布，法租界“倘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随至随议。”在此之前，美国第一任驻沪代理领事吴利国就职，设领事馆于英租界内。后来，另一美国领事祁理蕴到任，两人均升起美国国旗，这一举动都曾引起英领事的一再抗议。如今，当法租界划定后，美领事立即向上海

道台抗议，竭力反对其他各国人士必须取得法领事同意后才能依法租界租地的规定。英领事则从自身利益出发，与美领事采取了相同的态度。与此同时上海道台同意以文惠廉主教为首的美国圣公会教士，利用虹口地区（英租界北面）建造教堂，并把这一带划为美国租界。咸丰 3 年（1853 年），金能亨任美国驻上海代理领事、英国正式同意美国人在英租界内租地可以不经英国领事，从而放弃了土地章程中所给予英领事的专管特权，悬旗问题也随之解决。至于法领事所取得的对法租界的专管权，由于英美两国的共同抗议终未严格实行。同治 2 年（1863 年），上海道台又被迫划定苏州河北岸，面积约 7856 亩的区域为美国租界。同年，美国租界和英国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至 20 世纪 30 年代，其领域扩展到 8 万亩。自从英国在上海建立第一个租界以来，其他西方国家援引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纷纷在中国商埠划地立界。至光绪 30 年（1904 年），英、美、法、俄、德、日、意、比、奥等国在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长沙等十六个城市，强占租界 30 多处。

上海租界建立初期，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还有干预权。《上海租地章程》规定，租界内土地为永租而绝非卖绝，即保有领土主权。但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扩大和加深，无论单一国家管理的租界，还是几个国家共同管理的“公共租界”，它们所建立的殖民地制度都在不断加强，而中国在租界中所保有的权利渐渐被侵犯以至完全被排斥。咸丰 4 年（1854 年）7 月，英、美、法三国公使趁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擅自制定“管理章程”，在租界攫取了一系列特权，主要有：片面修改租地章程，规定外国可以在租界内设立警察和收税；成立工部局，由金能

亨等七人任董事，下设若干委员会。其中“防卫委员会”由英、法、美在上海的海军为其主要支柱，并设立警察、税务、财务、学务等办事机构。工部局实际是一个市政机关；攫取警察权、调香港巡捕房高级职员充任上海第一捕房总巡；巡捕可以拘捕罪犯，搜查军火，解除中国人武装以及协助收税等；夺取征税权，工部局以巡捕捐的名义，按房租的百分之八向中国人抽税，后来又以其他名目增添许多新税；工部局成立后，由其董事充当法官，轮流审讯，擅自审理租界内中国人的民刑案件，拒绝中国政府在租界内直接行使司法权。此外，以“领事代征制”控制上海海关行政权。成立英、美、法三国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拒不缴还欠税，其中仅借口清政府没有尽到保护上海英商的责任，就一笔勾销英国欠税四十多万两。在建立租界初期，是不准中国人到那里居住的。当修改上海租地章程时，外国的领事改变了这一做法。西方列强在华开辟的租界实际上是一个“国中之国”。

天地会起义

天地会创始于康熙年间，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名天地会。明太祖年号为洪武，因而天地会又自称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天地会以建立山堂、结盟、拜会等形式组织群众，盛行于东南诸省和长江流域，其支派甚多，东南沿海有小刀会、红线会；两广和湘赣地区有三合会、三点会、串子会、边钱会、红黑会，长江流域有哥老会、它是天地会中最大的派别。在南洋华侨中则用“义兴公司”（即振兴“义”气）等旗号，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统属，无统一的纲领。

和旗号。其主要成员有农民、手工业者、水手、流氓无产者和裁撤兵勇，成分比较复杂，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泛。鸦片战争后，天地会各派的起义遍布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太平天国革命发动后，天地会更大规模地举行起事活动。两广、两湖、两江等省，到处布满了天地会各派的势力。

广西省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后，一直是天地会活动最为普遍的省份之一。当太平天国还转战于桂平附近各州县时，广西各地天地会就纷纷发动起义。

咸丰 2 年（1852 年）太平军入湖广后，天地会继续在广西和清军战斗，他们攻克城镇、逐杀官兵，使清廷无法应付。咸丰 4 年（1854 年），广西天地会公义堂在胡有录、朱洪英的率领下攻克灌阳，建立了“升平天国”。胡有录称定南王，朱洪英称镇南王。不久之后，他们接受罗大纲的邀请，于咸丰 5 年（1855 年）6 月，攻占湖南东安，打算与太平军会合，但在会合途中遭到王鑫所部湘军的阻击。9 月，起义军作战失利，胡有录被俘牺牲。朱洪英率余部退回广西坚持反清斗争。咸丰 8 年（1858 年），转入贵州。

咸丰 2 年（1852 年），吴陵云、吴亚终父子在广西新宁发动起义，得到了各族群众的支持，起义军势力大增。他们所战皆捷。先后攻克新宁、养利（今大新）等府州县城，控制了左右江大部分地区。咸丰 11 年（1861 年）2 月，起义军在太平府建“延陵国”，吴陵云为“延陵王”。颁发诏令，设立官职，旋即攻占太平府城，并出兵进攻南宁。五月，清军攻破太平府城，吴陵云退守新宁陇罗圩。

同治元年（1862 年）12 月，清军包围陇罗圩，次年三月，吴陵云在突围中牺牲，余部由吴亚终、张三、刘永福等领导。几

年后，吴亚终等攻克了镇安（今德保），克天保县属各地，又分兵攻占归顺（今靖西），北围百色，泗城和云南边境各县村寨，纵横数百里，声势复振。同治 5 年（1866 年），广西提督冯子材来犯，起义军屡战不利，遂转攻龙州，占领凭祥。同治 8 年（1869 年），吴亚终在那宥中炮牺牲，余部由刘永福带领，退至桂越边境，以黑旗为帜坚持斗争。

广东也是天地会很活跃的省份。咸丰 4 年（1854 年）6 月，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在南海县佛山镇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同年 7 月，李文茂等人在广州北部佛岭市起义响应。广东人民万众云集，头裹红巾、蓄发易服，十多天内就组成了几十万人的起义大军，世称“红巾军”。陈开率领起义军进攻广州城，连克附近数县，围攻广州达半年之久。两广总督叶名琛率兵镇压起义军、英美法三国用轮船帮助清军运兵运粮。起义军力量不支，被迫退却，进入广西地区。他们在肇庆会合了广西天地会梁培友、伍百吉、吴超等部的起义军，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攻克了浔州府城。在这里建立了政权，国号“大成”，改浔州为“秀京”，陈开自称镇南王，李文茂称平南王，又设官分职，颁行法令。此后，“大成国”起义军以浔州为中心，向四周出征，势力逐渐强大，并且控制了东到梧州、西到南宁，南达容岭，北抵柳州等广大地区。然而不久之后，起义军在清军与地主武装团练的尾随堵截下，不断失利，再加上起义军内部各自为战，相继丧失了柳州等重要根据地。不久，李文茂兵败死于怀远山中。咸丰 11 年（1861 年），又丢失了固守已久的根据地浔州。陈开逃出浔州不久，被地主团练杀死，“大成国”起义从此失败。

道光 29 年（1849 年）刘丽川抵达上海，同周立春等天地会首领一起建立了小刀会组织。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江苏天地会

也大举响应。咸丰 3 年（1853 年）9 月 5 日，周立春率领嘉定农民起义军攻占嘉定城后，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在上海起义。起义当天，立即建立了政权，建号“大明太平天国”，刘丽川被推举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宣布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小刀会在十多天内连克青浦、川沙、南汇、嘉定、宝山等县城，并准备和苏州的小刀会起义配合，夺取苏州。然而，由于受到清军的进攻，所得县城又落入敌手。于是起义军坚守上海孤城，经过 17 个月的浴血奋战，于咸丰 5 年（1855 年）2 月，弃城突围，刘丽川不幸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有的辗转流落到江西参加了太平军，有的参加了江西的天地会起义。

咸丰 3 年（1853 年）5 月，福建小刀会在海澄县起义，连续攻克了漳州、厦门、漳浦等地，并以汉大明统兵大元帅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痛斥清廷罪恶。与黄威领导的厦门沿海地区的小刀会起义相呼应的是林俊率领的福建红线会起义。9 月 26 日他们攻占了仙游城，杀死知县，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宣布起义军的政策和措施。林俊转战闽北山区达五年之久，曾与太平天国联合，受封为烈王。

与此同时，湖南的天地会由浏阳人周国瑜“聚党逾万人”发动起义，建号“征义堂”。此时道州人何贱苟自称“普南王”，也率领衡州、永兴、桂阳常宁等地的天地会发动起义。这支起义军以常宁的五洞、桂阳的白水洞为中心，在周围十余县抗击清军。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西征。

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边钱会就已经活跃在江西吉安、建昌等地区。咸丰 6 年（1856 年）8 月，边钱会聚众数千，在吉安、建昌交界处发动起义。在太平天国的支援下，一举攻破南丰、新城、贵溪、铅山等县城，清建昌知府何栻受毙命。9 月又攻占广

信府城。

天地会起义和北方的捻军起义以及西南山区各族人民的起义，此起彼伏，有的与太平军直接联合战斗，有的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形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起义高潮。

回民起义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期，在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的回族人民先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主要有云南回民起义、西北回民起义和贵州白旗起义。

咸丰 4 年（1854 年），云南临安的汉族豪绅与回民争夺楚雄石羊银矿，因而掀起了汉回的互斗。第二年，殴斗继续扩大，禄丰、罗次、镇南各地回民被杀甚多，而且愈演愈烈。于是，回民首领马凌汉起来组织回民自卫武装，并到昆明申诉。而云南的官吏却认为是“造反”。竟在昆明也制造了屠杀回民的惨案。巡抚舒兴阿且密令各府、厅、州、县的官吏和地主豪绅聚团杀回。这样，云南回民被迫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

咸丰 6 年（1856 年）6 月，姚州回民首先起事，攻占了州城。各地回民相继响应。在滇西，杜文秀起于蒙化、蔡发春起于顺宁、杨荣、虎应龙起于鹤庆、丽江；在滇南，马德新起于新兴，马如龙起于临安北面的曲江，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明，徐元吉起于徵江；在滇东，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回民起义遍及云南全境。

滇东、滇南各族人民起义之初，组织比较分散，各自为战。随着起义军力量的不断壮大，便逐渐从互相支援发展到联合行

动。咸丰 7 年（1857 年）夏，马如龙、马德新、徐元吉等率领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二万人向昆明进发，7 月 12 日，起义军兵临昆明城下，随即发动对省城的围攻。云南清军全力阻截。次年五月，清军收买了马德新、马如龙等人，采取“以回杀回”的策略，利用他们屠杀其他各支回民起义军，不久，昆明附近的起义军相继失败。滇东、滇南的起义被镇压下去。

此时，滇西回民起义军在杜文秀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

咸丰 6 年（1856 年）8 月，杜文秀乘云南提督文祥率兵离大理赴楚雄的有利时机，在蒙化率众起义。9 月 7 日，杜万荣、蓝金喜在大理府城起义。杜文秀闻讯立即率起义军前往大理，与当地回民会合，大败清军。几天后，起义军占领了大理城。杜文秀组织指挥击退了鹤丽镇千总张正泰对大理的进攻，并明确提出“欲做大事，必须收拾人心，不宜专尚威力。且汉众回寡，尤须重用汉人”。杜的主张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10 月 23 日，滇西回民起义军齐集大理校军场，筑坛拜帅。杜文秀以原提督署为大元帅府，组织大理政权。授蔡发春为扬威大都督，总各路军事，其他文武官员也各有职称。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并通令“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以示推翻清朝统治的决心。此后，他们又制定了各种法律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各族人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改善民族关系；减轻人民负担，努力发展生产；制定军事制度，严格组织纪律。

大理政权建立后，杜文秀利用良好的地理条件，修营筑垒，屯集粮草，做好防御清军进攻的准备，从而使处于劣势的起义军粉碎了多次的武装“进剿”。

在杜文秀指挥下，滇西起义军迅速扫清了大姚、姚州等地的

残余清军，各将领乘胜向滇西各地清军发起进攻。几年之内，滇西二十余厅州县都在大理政权的控制之下。

同治 6 年（1867 年），杜文秀乘清军从云南调往贵州镇压苗民起义之机，发兵 10 万大举东征，由 18 大司统率，兵分四路，向云南省城昆明进攻。尽管围攻楚雄的起义军暂时受阻，但其余各部进展颇为顺利。9 月间，起义军占领黑、白、琅等盐井，控制了盐井的税收，断绝了云南当局至关重要的财源。随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陷广通、禄丰、南安、元谋、武定、禄劝，切断了楚雄与昆明的联系。楚雄孤立无援，军火粮饷皆缺。12 月 18 日，起义军一举攻占该城。至此，起义军控制了滇西全境。后路毫无牵掣，军锋直指昆明。起义军在昆明外围的东、南、北三个战场上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同治 8 年（1869 年），清军调集重兵救援省城。起义军屯兵昆明城下一年有余。由于战线过长，粮弹短缺，加之传染病流行和频繁战斗，部队大量减员，特别是久攻昆明不下，斗志大受影响，士气消沉，在清军“剿抚”兼施威逼下，滇西回民起义军东征彻底失败。

此后清军相继攻占了南安、楚雄、定远等地，岑毓英指挥清军分三路向滇西大举进攻。为了保卫大理，阻止清军长驱直进，杜文秀采取重兵防守姚州、镇南等地，以一部兵力节节阻击的方针，击退了清军多次进攻。

同治 11 年（1872 年）3 月，清军进逼大理，清军曾多次挖地道炸城，攻入城内。起义军拼死反击，但情况一天比一天险恶。12 月，杜文秀见大势已去，乃服毒后往投清营，被杀。

清军又相继攻占了顺宁、云州。同治 12 年（1873 年）5 月起义军最后一座城市腾越失守。至此，坚持了 18 年之久的云南回民起义完全失败了。

在太平天国革命后期，陕、甘、宁、青等地的回族人民，在太平军和捻军的影响下，先后发动了反清起义。

同治元年（1862年）春，太平军陈德才部西征攻打西安之时，回民领袖任武、赫明堂、洪兴等人领导了华州和渭河两岸的起义，同当地的汉族地主武装——团练展开了斗争。起义军攻占了孝义镇、羌白镇等地，起义势力已控制了渭南，大荔两县的大部地区。起义军组成了 18 大营，由赫明堂、任武等分别统率，并推洪兴、任武为元帅，统一指挥。起义军以渭南，大荔为根据地、分兵四出，进而围攻凤翔、西安两府，一时形成了“东西南北、云合响应”的顺利发展局势。

清政府派胜保为钦差大臣来陕镇压，被回民军打败，又派多隆阿为钦差大臣前来镇压，仍被起义军屡次击败。于是多隆阿便使用分化起义军的手段，派人去“招抚”。有些起义军将领动摇，接受了“招抚”。这样，清军轻而易举地就进占了起义军的重要据点王阁村、羌白镇，给起义军带来了不利。最后起义军不得不退到陕西。甘肃边境的董志原，联合甘肃回民起义军，继续与清军战斗。与此同时，甘肃回民在平凉起义，很快占领了灵州、河州、西宁等地。起义军在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一个是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包括宁夏府和陇东在内的起义区；一个是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回、撒拉、东乡族起义地区；一个是先后由马文义、马桂源和马本源领导的以西宁为中心的起义地区；一个是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为中心的起义地区。起义军屡败清军，切断了陕西同甘肃的交通，占领了很多地方，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摇摇欲坠。

同治 6 年（1867 年），清政府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大批清军从湖北进入陕西镇压回民起义军。他在“先秦（陕西）后陇

(甘肃)“先擒(擒军)后回(回民军)”的方针指导下,把擒军镇压下去以后,便集中全力进攻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军。在重兵进攻下,董志原的回民军向西撤退到金积堡一带与马化龙起义军联合。

同治 8 年(1869 年),左宗棠的北路军猛攻金积堡。在长期围困下,金积堡的起义军粮尽援绝。但起义军誓死抵抗,在“堡塞将破时,先刃其家属,或掷诸水火乃解衣格斗,死而后已”。但马化龙却在同治 10 年(1871 年)10 月,投降了清朝。左宗棠在受降后,对放下武器的回民,纵兵大杀不留一人,马化龙也被“凌迟处死”。

同年,左宗棠的南路军被马占鳌打败,损兵折将,但不久后马占鳌又率部投降。

第二年,左宗棠又集中兵力围困肃州,经过 18 个月,最后占领了肃州,马文禄叛变后被杀。

陕甘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坚持了 12 年之久。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内部又不断有将领受招抚,结果遭到失败。

咸丰 8 年(1858 年),贵州的普安大坡铺一带的回民起义,推举张凌翔、马河图与金万照等为首领,起义军以白巾帕首,自称白旗。几年后占有新城、兴义、普安、安南、贞丰、归化等州县,人数达 10 余万,在新城建立政权。

同治 3 年(1864 年),贵州提督赵德昌率军进攻,起义军战败,张凌翔、马河图被杀。其余部继续坚持斗争。同治 9 年(1870 年)贵州巡抚曾璧光以云贵两省军力进攻起义军。由于寡不抵众,坚持斗争达 14 年之久的白旗起义军终于在同治 11 年(1872 年)彻底失败。领导人金万照被捕遇难。

亚罗号事件

英国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于 1856 年 10 月借口“亚罗”号事件又向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亚罗”号是中国的船。船的主人叫苏亚成。他曾经在香港购买过一张登记证，因为期满，所以没有挂英国国旗。10 月 8 日，亚罗号从厦门开往广州，停泊在黄埔。广东水师千总梁定国接到一份报告，说有几名海盗藏在这条船上，逮捕了船上 12 名中国水手。

这时，英国驻广东领事巴夏礼横蛮无理地加以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中国人上船捕人是违反了中英条约。并且说广东水师曾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这是对英国的侮辱。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上捕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根本与英国毫无关系。英国人之所以这样制造事端，是为了寻找一块踏脚石，发动侵略战争。为此目的，巴夏礼在英国公使包令的指使下，向清政府提出了“有礼貌地送还被捕水手；书面道歉；担保以后尊敬英国国旗”的三项无理要求，限令 48 小时答复。同时，巴夏礼亲自到包令那里接受指示，决定借此机会向清政府发动武装进攻。

10 月 22 日，英国军舰在海军头目西马糜各里的指挥下，闯入省河，占领了沿江炮台，用大炮袭击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一面假作镇静地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一面下令水师“不可放炮还击”。10 月 29 日，英军乘机入城，烧杀抢掠。无比愤怒的广州人民奋起反抗，烧毁了十三座洋行和英美各国使馆，打烂了英国侵略者在陆地上的一切据点，迫使他们全部逃回船上，退出广州。

1857 年春，“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政府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强行通过了扩大侵略战争的提案，并且任命额尔金为全权大使，率一支侵略军前来中国。同时还向法、美、沙俄政府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

法国政府如获至宝，任命葛罗为全权大使，并派一支侵略军队开往中国。美、俄两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失的机会，也派出了全权大使，同英、法密切配合，从中渔利。1857 年秋，英、法、美、俄四国强盗会集在香港，阴谋策划“联合行动”。当英、法作好一切战争准备之后，于 12 月 12 日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入城修改条约，赔偿损失，限 10 日答复。如果不照办，立即命令水陆两军攻城。叶名琛对英、法的侵略行动根本没有准备，却说：“此事我确有把握，可保其无事，大约过十五日便可了结。”英法乘清军不备，于 12 月 29 日发动了“极端不正义的战争”。

英法侵略军轰炸和抢掠广州后，又继续北上进犯白河口。他们认为天津靠近北京，又是水上枢纽，只要控制了天津，就能迫使清政府就范。英法打着这样的算盘，于 1858 年 5 月 20 日对大沽发动了进攻。美俄的舰艇也赶来为英法助威壮胆。直隶总督谭廷襄和一些大官僚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英法侵略军得以横行无阻，直扑天津近郊。清政府惊恐万状，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赴天津求和，表示投降。1858 年元月 26 日和 27 日分别和英法两国签订了《天津条约》。这时，美、俄两个强盗混水摸鱼，以“调停”有功，也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

外国侵略者得寸进尺。《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并不甘心，又以上北京换约为名，于 1859 年继续北上，先后占领大沽